

凯恩斯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特点

乔洪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本世纪西方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学说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说。在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中，还包含有发人深省的经济伦理思想，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都忽视。本文试图就凯恩斯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进行探讨。

—

与其他著名西方经济学家不同，凯恩斯的一生正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大衰退、大动乱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身逢危世的凯恩斯当然再也不能像亚当·斯密那样为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高唱赞歌，也不能像马歇尔那样“为求知知识而求知”而两耳不闻窗外事了。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政治家的他满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责任心，积极著书立说，鼓动社会舆论，并亲身参与一些重大国际行动，试图将资本主义从萧条和危机之中拯救出来。由此，他表达出了与前人和同时代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经济伦理思想。

1. 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的教条，主张国家干预，并把这种干预看成是合乎伦理的政策。

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推出《政治经济学概念》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一个根本性命题：“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这一命题，长期被英、美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普遍信奉，被誉为“萨伊定律”。虽然，面对长期萧条和庞大的失业大军，马歇尔的学生庇古从1908年起就开始攻击斯密——李嘉图——财政部关于反对用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的观点，但直到1929年，英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仍坚持自由放任的教条，反对用公共开支来减少失业。凯恩斯从20年代中期起，就表示出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的价值取向。

1924-1926年，在牛津大学和柏林大学的两次演讲中，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假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让我们把那些时常作为放任主义根据的抽象或一般原则，彻底澄清一下。认为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一向拥有‘天赋自由’，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世间并没有‘合

约’；对于有所占有或有所取得的那些人，曾给以永恒权利。说是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定互相一致，这一点并无根据，上天并不是这样来统治世界的。说是两种利益实际上互相一致，这个说法也不确，在下界并不是这样来管理社会的。说是开明的利己主义总是为公共利益努力的，这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况且利己主义一般也并不是开明的；当个人各自从事于争取实现他自己的目的时，往往会过于愚昧，或过于脆弱，甚至连这方面的目的也难以实现。经验没有能证明，说是当许多个人组成一个社会单位时，比他们单独进行活动时，其精明干练的程度就一定差些。”显然，凯恩斯在此的矛头所指，正是斯密关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无形中增进了公共利益的观点。

在批判自由放任主义的同时，凯恩斯力主加强国家干预，并认为这是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唯一正确选择。他说道：“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加强中央机构对通货与信用的审慎管理，即“凭着集体动作的力量，对现代资本主义在技术上有所改进。”1936年，凯恩斯推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该书系统否定了总需求恒等于总供给的古典经济学教条，坚持国家干预是保障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的主张。凯恩斯强调：“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同时，“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制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总之，“我们的最后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到几个变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管理。”

2. 凯恩斯反对失业有理的论调，主张充分就业，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了辩护。

自本世纪初到凯恩斯的《通论》问世的这一历史时期，英

国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开始关注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问题。然而,包括庇古在内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下是不存在不自愿失业的。现实生活中只有“摩擦的”失业和“自愿的”失业。庇古就曾这样说过:“如果任何工人要求发给的工资率人为的高于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时所得出的工资率,那么纵使在完全静止的情形下也会发生失业现象。”这一理论,实际上是说自由市场经济下本不会出现的失业现象,只不过是工人不愿工作所致,所以他们理应没有工作。只要他们愿意接受相当低的工资,就不会有失业。按此“失业有理”的论调,似乎丧失工作,在贫困中挣扎的失业者的恶运还不够差,还要向他们泼一盆“好逸恶劳”、“好高务远”的脏水。很显然,这完全是在为工商业主的利益说话。

凯恩斯坚决反对古典学派的上述理论,他指出:“经典学派之两种失业范畴,能够概括一切失业现象吗?事实上,总有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工作,但无工可作。”“而且,说不景气之下之失业现象,是因为工人不肯降低货币工资而引起的,也并不显然与事实相符,如果说美国1932年之失业原因,是因为劳工们坚持不让货币工资降低,或坚持要求一个超过经济机构生产能力所能负担的事实工资率,也不易令人置信。……这些经验中得来的事实已足构成初步理由,令人怀疑经典学派之分析是否合适。”凯恩斯认为不自愿失业是存在的——“设当工资品之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而言——上涨少许时,现行货币工资下之劳力总需求与总供给量,皆形增大,则称之为有不自愿失业之存在。”而不自愿失业存在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只要有效需求可以不足,则就业量就可以——而且常常——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准以前,即行中止而不再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常常阻碍生产,——虽然劳力之边际产物,尚大于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肯定不自愿失业的存在是因有效需求不足所致,这不仅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推翻了新古典学派关于“失业的责任要由工人自己负责”的失业有理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凯恩斯对当时英国政府对待严重失业现象的麻木不仁一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指出:“消极、限制、懈怠——这些就是政府的看家本领。”¹⁰“我们如果静坐一旁,对任何建议只是加以挑剔,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采取这样的态度似乎很聪明。但是当我们袖手旁观的时候,失业者未经获得利用的那份劳动力,却不能蓄积起来,……这些劳动力,都无可挽回地浪费了,都一去不复返了。”“就失业者自身方面说来,损失还要大得多,体现在失业津贴与十足工资之间的差额,以及这部分人在体格上、精神上的消费。”¹¹他呼吁政府应积极行动起来,“就像在战争中面临大敌的时候一样,应当具有最大决心,具有在不惜任何代价下行动起来的精神,来改善当前事态。”¹²凯恩斯的上述理论

和政策主张,反映出他同情工人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辩护的立场。

3. 反对勤俭节约, 主张扩大消费。

熊彼特在评价凯恩斯的《通论》时指出:“凯恩斯似乎提出了这样一种论点,即‘储蓄这一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经常赞赏的重大美德实际上是一种恶行,在他看来,储蓄并不是资本形成的原因,倒是失业与资本毁灭的根子。’”¹³实际上,早在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者那里,勤俭节约就被大力赞扬为一种美德。如英国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就谴责当时的奢侈之风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自毁国力的行为。斯密、萨伊和西尼耳等只不过是继承了重商主义的这一传统。

与上述古典学派的价值取向相反,凯恩斯认为节俭是导致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1931年,他在一次广播演说中说:“今天有许多好心肠的人相信,要改进局势,他们本国和邻邦所能尽力的是,比平常更多地节约些。但在目前环境下这样做却是一个重大错误。……节约的目的是使工人解除工作,使工人不再从事于房屋、工厂、公路、机器之类的资本货物生产。如果可以用于这类生产目的上述资金,已经有了很大的剩余额没有使用,这时进行节约的结果只是扩大这种剩余额,因而使失业人数格外增加。还有一层,某个人在这一方式或任何别一方式下失去了工作时,他花费的能力就有了萎缩,这就会进一步造成失业,因为别人原来所生产的事物,他现在买不起了。这样就使情况一天恶化一天,造成恶性循环。”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论什么时候你节约了五先令,你就要使一个人失去一天工作。另一方面是,不论什么时候你购入了商品,你就促进了就业机会。”为此,他呼吁道:“爱国的主妇们,明天一早就出发”;购买那些便宜货不仅使你直接获益,“还有一点,你想到会更加高兴,你买这些便宜货时,是在促进就业,是在为国家增进财富。”¹⁴

在《通论》中,凯恩斯更是系统分析了增加消费对于增加就业的重要性。他沿用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话说:“储蓄不仅使个人致富,也使社会致富,消费不仅使个人变穷,也使社会变穷。现在我们想指出:第一,这些结论不能成立;第二,储蓄习惯可能行之过度;第三,若行之过度,则社会变穷,工人失业,工资降低,整个工商界变成阴暗惨淡,这就是所谓不景气。”“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在正常情形之下,是消费限制生产,而不是生产限制消费。”¹⁵对于斯密的“节俭是德”的观点,凯恩斯公开批评道:“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在当代情形之下,财富之生长不仅不系乎富人之节约(像普通所想像的那样),反之,恐反遭此种节约之阻挠。”¹⁶凯恩斯认为,政府为缓解失业压力,在公共开支上不应谨慎理财,量入为出,而应大量举债用于公共工程投资,“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¹⁷他反复强调人们必须了解:“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

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¹⁴⁶“经典学派之所以称扬节俭为美德者,因为他们暗中假定着:利率的确与充分就业不悖。”¹⁴⁷而事实是与上述假定相反的。仍顽固坚持“节俭是德”的传统,“只会得到罚,不会得到赏。”¹⁴⁸

二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后,西方经济学界立即将其赞誉为一场“革命”。然而,从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革命”并不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伦理观的彻底否定,而只是对它们的部分扬弃。凯恩斯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二元性。

1. 凯恩斯继续坚持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经济人”的假说,又表示了很强的非功利性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按照凯恩斯在《通论》中的分析,决定就业量的因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流动偏好和对资产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那么,这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最终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从消费倾向来看,凯恩斯指出:“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不疑。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¹⁴⁹为何如此呢?凯恩斯认为,就个人而论可能有8种动机影响其不以其所得用于消费,这8种动机是: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和贪婪。就本质而论,凯恩斯所列举的这些动机,不过是“经济人”这一根本假设的具体化。“边际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门格尔就曾指出:“各个具体的欲望满足,对于人类具有不同的意义一事,虽从来很少被研究者们注意,但却为一切经济人所熟知。……经济人一般对其各种欲望满足的意义,特别是对满足这些欲望的各个行为的意义,通常都是相互地加以衡量,最后在经过检查以后,才决定他们应该怎样行为,以求其欲望尽可能完全的满足。”¹⁵⁰所以,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规律仍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基础的。再从流动偏好来看,凯恩斯认为马歇尔等关于利息是等待的报酬的解释是错误的,“错误之处,乃由于把利息看作是等待本身之报酬,而不看作是不贮钱之报酬。其实各种贷款各种投资都有风险,只是程度不同,故由贷款或投资得到的好处很可以看作是甘冒风险之报酬,而不是等待本身之报酬。说老实话,由贷款或投资得到的报酬,与所谓‘纯’利率之间,并没有清楚界线,这些都是甘冒一种或其他种风险之报酬。”¹⁵¹正是从上述定义出发,凯恩斯认为就利息理论来说,除了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之外,最需要注意的是人们的投机动机——它最明显地体现着经济人甘冒风险的精神。

尽管凯恩斯的上述定义和政策结论都与古典学派的不同,但是,从其将利息视作甘冒风险的报酬而不是消极“等待”的报酬来看,他只不过是更加科学地把握了古典学派“经济人”假说的内涵,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最后,从资本边际效率率来看,凯恩斯认为,心理预期是至关重要的。而心理预期又分作短期与长期两种。就短期预期而言,它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即企业家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故除非生产者有具体理由,逆料未来将有改变,否则,如果他们预期最近实得结果仍会继续,实在是合理的。”¹⁵²对于长期预期,“不能完全依据严格的冷静盘算,——事实上也没有方法作此种计算。”决定长期预期的大部分动因,“与其说是决定于冷静计算(不论是道德方面、苦乐方面或经济方面),不如说是决定于一种油然而发的乐观情绪。”¹⁵³从以上论述来看,凯恩斯只是就长期预期而言否认了古典学派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人总是会精确计算自身的苦乐得失,他甚至还认为非理性的动机会起决定作用——“在需要原动力之处,理智不能不依赖想像、情绪或机缘。”¹⁵⁴但在短期预期中,他仍坚持认为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这是与古典学派一致的。

如果说,凯恩斯在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时,所坚持的大部分仍然是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说的话,那么,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时,他则背离了“经济人”的假说,坚持的是非功利的价值取向。首先,在分析论证了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缺口之后,凯恩斯根据卡恩的乘数概念,力主政府增加公共工程方面的投资以弥补这一缺口,扩大就业水平。这时,凯恩斯认为国家不应该像“经济人”那样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他说道:“现在我们变得合理了,我们把自己训练得像是一个谨慎的理财家,为后世建造房屋时,会审慎考虑到加于后世的财政负担,所以他们已经没有简便方法,可以逃避失业之痛苦。私人致富之道,应用于国家行为上,失业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¹⁵⁵他认为,即使是浪费性的支出也总比不支出好些,“如果政治家因为受经典学派经济学薰染太深,想不出更好办法,则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¹⁵⁶他甚至建议道,财政部以旧瓶装满钞票,埋于地下。然后将此区域之开采权租与私人,让私人企业开挖,这样既能解决失业问题,又能增大社会财富。其次,在论及资本边际效率这一心理因素时,凯恩斯认为由于人们的长期预期往往不稳定,因此仅靠私人投资是不够的,光用货币政策也是无效的。他指出:“我现在有点怀疑,仅仅用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会有多大成就。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品之边际效率,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¹⁵⁷要求国家从远处着眼,为社会福利着想,这显然隐含着如下一个假设:国家的政治权力阶层是非功利的“非经济人”。1944年6月28日,凯恩斯致信哈耶克,回击哈耶克对《通论》

的批评时强调：“我对你的论题所作的结论颇不一样。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无计划或者少计划，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几乎肯定需要更多的计划。……稳健的计划将是安全可靠的，如果那些执行计划的人在道德问题方面思想方向正确。这是已经部分地证明为确凿的事实。”⁴⁰由此可见，凯恩斯坚信“非经济人”是一种客观存在。他的国家干预论的逻辑出发点正是建立在政府是一个非功利的“道德人”之上。

2. 凯恩斯既对当时的市场经济制度提出了强烈的道德批判，又对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的工具性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通论》的结语“略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中，凯恩斯明确指出：“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真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就我本人而论，我相信的确有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可是不均得像今日那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⁴¹凯恩斯甚至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消灭坐收利息阶级以改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这样说道：“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之有坐收利息阶级，乃是一种过渡时期现象，其任务完毕时即将消灭。坐收利息阶级一经消灭，资本主义便将大为改观。”⁴²他认为，确立以下两种目标便可以促使食利阶级的自然消灭，第一，增加资本数量，使资本不再有稀缺性；第二，建立一个直接税体系，使投资者在合理报酬之下为社会服务。他乐观地预期道，由于这些人对于本行都非常有兴趣，故即使报酬比现在低许多，还会乐于投资。所以，“以上两种目标并没有窒碍难行之处。”⁴³

但是，凯恩斯尽管对市场经济表示出强烈不满，却依然肯定其在解放生产力方面的工具性价值。还是在《通论》的结语里，他说道：“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效。而且，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也因为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假使没有这条泄曳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固然，有人说，前者是后者之手段，但至少有时前者也可以替代后者。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像今日这样大。……在一理想社会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⁴⁴在这里，他认为市场经济制度尽管不是人类的最优选择，但可能是人类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次优选择。人们集中精力于发财致富总比专注于政治争斗、兵刃相见要好些。“发财欲”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人们走向比较无害之途。在此之前的1930年，凯恩斯在一次演

说中把上述思想说得更加通俗易懂：“当经济富裕的境地已经达到，财富的累积已经失去了高度的社会性时，社会的风俗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有许多伪道德已使我们受累了二百年，在这些原则下我们把人类性格中某些最可厌的成分抬举了起来，看作是最高品质；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胆量按照它的真价来评价。……凡是要影响到财富分配、经济报酬以及经济处分的那些社会习惯和经济设施，不管它们本身是如何地使人憎恶、如何地有欠公道，只是由于它们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我们即不惜以任何代价来加以支持；到那个时候我们将无所顾虑，把它们完全摒弃。”⁴⁵也就是说，伴随着二百年市场经济发展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不过是些“伪道德”，是“最可厌”的东西。只不过在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的道德觉悟水平的约束下，人类为了发展生产力所需还不得不“抬举”它们。只有在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富裕程度有了极大提高以后，我们才能够彻底抛弃市场经济制度和与它相伴的经济伦理秩序，重新走向德性中心的世界。

综上所述，凯恩斯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二元性也独具特色。今天，对凯恩斯的经济伦理思想加以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以及对于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1版，1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 11 12 14 35 [英]凯恩斯：《劝说集》，中文1版，236、242、241、104、93~94、116、117、2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15 16 17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31 32 33 34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1版，208、14、19、32、313、318、109、92、96、96、85、153、48、137、138、111、109~110、139、317~318、320、321、318~3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英]庇古：《论失业问题》，中文1版，1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3 [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中文1版，5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0 [英]哈罗德：《凯恩斯传》，中文1版，4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2 [奥]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文1版，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曾国安)